

我的故事 ~ 8. 中国农村娃至澳洲大学教授



“我衷心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”

在国内时，我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地理研究所工作。在出国前参加培训班学习英语的时候，美国教会派来的英语老师，从《圣经》中给每个人取了个英文名字，他叫我迈克。

我是从东北农村出来的，父辈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。我的家乡阳明堡乡，当年是炸日本机场的地方。自从1976年高中毕业，就在村大队部做团支部书记，当民兵副指导员。1977年，中国恢复高考制度，大部分高中毕业生开始考大学，虽然我是在县城里读的高中，但对数学、物理和化学，尤其是无机化学、有机化学都分不清楚。当时的农村学校，上课很不正规，也没有教材，高中毕业后，在村里又担任行政职务，几乎没时间复习，所以特意回到县城高中复习了三个月。对报考上什么学校，选什么专业一无所知，只知道男孩子学工的多，因此，所有的志愿我都报的是工学院，最后一个志愿是山西师范学院物理专业。录取通知书下来才知道，每个省里都有一个重点师范院校，和重点院校同时录取，只要你是服从分配都能被录取。作为一个农村孩子，我心想只要能考上大学，以后就会有工作就会有饭吃，无论上哪所大学都行，上师范大学更好些，没有学费，国家还给每个人发粮票和补助金，因此就服从分配了。被山西师大地理系录取了。天啊，肯定是打错字了吧？物理和地理就差一个字，我急三火四，忐忑不安地跑到太原招生办想问个究竟。自己心想肯定是他们搞错了。招生办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没搞错，地理系就是理科。他们还说地理系是师范院校里最好的系，毕业后不用当老师。是唯一一个可以在地震局、水文站以及国土局工作的专业，当时还挺高兴。那就学地理吧，入学之后，我很努力地学习进步也很快。

作为一个农村孩子，通过考大学，金榜题名，在我一生中，那个录取通知书对我是太重要了，它意味着自己可以永远离开农村，可以找个吃商品粮的老婆，不会一辈子呆在农村，面对黄土背朝天了。上大学以后，从一无所知，到慢慢喜欢熟悉大学生活，那时候77、78级学生学习都特别努力，自己更加倍勤奋，被推选当学习委员，学习委员成绩必须拔尖才能在同学中有威信。我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，毕业的时候，平均分最高。那时教师知识水平教学质量不是特好，大部分老师是从“五七”干校回来的，

上课照着书本念，所以我们只能靠自己用功自学。英语都是零起点，第二年我就参加英语竞赛，非英语专业竞赛组我就榜上有名，在我们系是唯一获奖人，学习劲头越来越足。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听说可以报考硕士，就开始准备。考试结果，我同时得到了物理系和化学系两个通知书。我是地理系有史以来第一个考上研究生的人，全校一共考上三个。来自小地方的我，考的是中科院长春地理研究所，在当时已经够出色了。拿到这个通知书，激动不已，考上大学是我人生第一大转折，考上硕士算是锦上添花了。

研究生读了三年，毕业以后，分到中科院，单位很器重我，但要想出国学习深造那可不容易。作为国家第一批人才，单位不会轻易把人放走的。科学院出国名额特别多，我工作了三年，才拿到一个公派名额，做访问学者。我选择了温哥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，导师是一个亚洲问题研究所的主任专家。这一年期间，我们在一起交流共同做了一个项目，当时他提出一个新的理论，研究亚洲城市化和城市群的特征差异，很多学生参加这个项目，其中有研究中国长江三角洲、珠江三角及澳洲，我选择研究大连沈阳城市群，及新加坡城市群。导师当时鼓励我考托福，我得到一个奖学金，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涯。

由于当时我妻子和孩子还在国内，犹豫自己是否继续念下去？那时送到手的绿卡我都没敢要。考虑到家庭就必须回国，因为我是第一批研究生毕业，第一梯队培养对象，国内单位对我的待遇也非常优厚。就在我举棋不定的时候，导师帮我解决了一切问题，让我没了后顾之忧，所以决定留下来。导师在研究亚洲问题方面很出名，所以加拿大驻中国大使，文化参赞去中国之前都要来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做讲座，他就给学校写了一封信，高度称赞我，请求帮助解决我家属和孩子的签证问题，由于这封极好的信，我妻子和孩子就拿到了签证，我也申请到了读博资格。

读博士时还是挺艰苦的，尤其我是读社会科学，文科在西方，在这个行当里面，你要做学问还是挺难的。1995年做完博士论文，开始找工作，几经周折才找到了墨尔本大学任教职位。当时我和温哥华的一位同学，同时得到这次面试的机会，同学是个洋人，讲地道的英语，我心想自己可能比不过他。面试定在洛杉矶，当时那个系主任，还有另一个澳洲学生，一共5个人被选参加面试，我想我更不可能了，就很放得开，越放得开就越答得好，最后准试的是我，挺意外。时隔多年，我还记得当时面试官对我说的话，他说，系主任和教授们都很喜欢我，喜欢我的学术研究方法，也因为我是中国人，研究中国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精通，因此，把这个位子给了我。那时候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，这回可算是我人生中第三次重要转折点，决定了我和家人未来生活的去向。

来到澳大利亚，一切还算顺利，在学院里的亚洲研究课题组，我更多侧重亚洲发展、环境问题、农民工问题、水资源问题的研究、粮食安全问题，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城市化发展问题，我们都经常有所合作。慢慢地就从讲师晋升到高级讲师，副教授到教授。

之后负责管理教学，担任了一段行政工作。再后来，主要担任国内一些社科基金项目，带博士和硕士研究生10个人，最近两年与他人合作出版三本书和十几篇文章，最忙的时候是既做院长，又带研究生，国内外都有项目，学术压力也比较重。

我从中国到加拿大，从加拿大到澳洲，感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差异。就像开车左行右行还得适应一段时间呢，但在这边工作生活更放松些。澳洲物价很高，特别是汽车价格很贵。做学问方面有一些细微的差异。在中国是靠单位给职工分房，在这里是租房住，打工赚钱等有能力就可以买房；在国内研究生、年轻的老师周末加班，挑灯夜战都很普遍，在澳洲，周末来办公室上班的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，最晚离开办公室的人还是我，这些就是差别。第二个差别，在这里教研究生，一门课一个星期只上两个小时，外加三个到四个章节的阅读，一个小时讨论课，一个星期如果超过两个阅读章节，学生就会投诉老师。其他方面，诸如价值观、隐私、交友等跟国内没有很明显的差异。

从农村考上大学，从一个轨道到另一个轨道，就像是变轨似的，一路走来还算顺利。对我来说，除了几个大的转折点之外，其他没有太大的曲折。最终选择到澳大利亚，选择了把自己的后半生扎根在这里，这一切都好像是天意，又像是命运之神的安排。我早起晚归，用英文上课到提职，买房卖房，拆了又盖，折腾几番，不算不顺利，过着平常人家的生活，我也感到很心满意足。

当然在学术领域里，也得遵循一些游戏规则，要学会你怎么进入角色，无论是本土人还是外来人，你要往上走就必须懂得一些游戏规则，包括发什么样的文章，做什么样的研究，哪方面的项目有重大意义，怎样才能拿到项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，这里面有很深的学问。博士毕业工作几年之后，我取得了指导博士生的资格。我和同事的关系都处的很好，我们一起做研究项目，可以说是我把学院有关对亚洲及中国的研究带起来的。现在开设有关此方面的很多课程，我现在也带学生去中国上野外课，做实地调查研究与分析。当然今天的成果是我和同事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完美的合作取得的。取长补短，勤学好问，向同事请教及时切磋，慢慢丰富自己，在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，使自己在大学站稳了脚跟，让自己心里踏实了很多，觉得自己在一点一点的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，逐渐的把澳洲当成了自己的家。

但是中国人和澳洲人还是存在着文化差异，有人把我们叫做香蕉人，我不这样认为。我们这批人是80年代初到澳洲的，具有东西方人共有的思维方式，很有潜力，转变的也很快。但有些中国留学生，只按照中国人思维，没有冒险精神，做事不按照导师行事，总得让导师牵着走，这是我到澳洲来在教学上遇到的难题。我带的第二个博士生，他不按照一步一个脚印、有条不紊的去做研究，我尽力帮助引导他，但他还是没有按期完成，而自己却偷偷摸摸干另外的事了。这是我作为博导很失败的一个例子。但我觉得这是文化导致的。我带出来博士毕业生成功的很多，有在昆士兰大学研究中心做主管的，相当于大学研究办公室主任，还有几个成为大学教师。教授多年的经验是，澳

洲学生很懂得课程的程序，他们与导师交流探讨问题是更主动。当然作为中国人我还是一直在尽量保护着中国学生，但又不能太过于人情味。多在暗中保护，不能轻易让别人觉察出来，我一直在努力培养中国学生的冒险精神，指导他们顺利完成学业。

我是二十七岁那年来澳洲的，虽说还有些稚嫩，但我的世界观已经完全成熟了，如果完全放弃我自己，我就不是我了。因为我觉得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生意，任何一个人，都要先有自我。没有自我，就没有价值了。玩游戏也要按照规则玩，之所以我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，因为我有中国背景，懂中国文化，接中国地气，他们很难找到像我这样的一个人，我可以带着一帮人回国做研究，他们很尊重我对科研的方法，很器重我，但我始终淡化自我，同时强化自我。

在澳大利亚大学里，作为一个中国人，带有的是中国文化，具有中国脸的教授，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觉得是一种自豪。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大学的一个国际化战略会议，大学校长出席了，当我自豪的介绍中国市场的前景时，校长觉得很新奇，他需要了解这方面的动态。他还点名让我讲，那是一种自豪的感觉；但有的时候，如果几个人坐在一起聊天开玩笑，他们的话题包含很地道的本土文化，他们喜欢谈球-曲棍球、橄榄球等，而自己对他们的话题，对本土文化不甚了解，心里就会有不太爽的感觉。在我们研究纯理论的时候，会遇到一些非常抽象的词，有时我就只能理解一多半，有时甚至更少些。当他们玩文字时，我会感到尴尬。我不了解他们的文化，不了解明星，对新闻里的体育永远不懂，不了解。有人问我是否进入了澳大利亚主流社会？我的回答是一半一半吧。出席正式的宴会，与同事聊天，一起喝酒、打牌，与他们交往，开个玩笑，这些都是能进入当地人的圈子的。还有一半，不是说你进不进去，而是你想不想进去。我有我自己的圈子。周末在一起吹吹牛皮，喝喝白酒，如果有老外在场，那会有点扫兴，因为他们不会喝白酒，那时候自己的感觉是，他们才是我们生活圈子里的“老外”。

什么是主流？主流社会的定义又是什么？到底存在不存在这样一个主流，因为即使是澳洲人，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，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。

有人问我说过：“像你这样的墨尔本大学教授，你不在主流谁在？”我一直自问，到底有没有主流社会呢？首先要定位一下什么是主流，一个人是各自那个主流的一部分，在我那个小圈子里面，我就是主流。在墨尔本有百分之十的中国人口，甚至更多些，在我的大学校园里，百分之二十都是华人，讲北京话，天津话，那我们就是主流之一。传统是一个广义的，全球城市下的主流和非主流，如果按照狭义来说，只有本土西方文化才是主流，在多元文化这个背景下定义的主流。从传统意义上来说，我们有其一部分，但不是我的全部，意大利人有自己的朋友圈子，也有别的文化的穿插，有文化趋同性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我不会为此感到困惑，我没有感到被边缘化。我可以进入所谓的主战场，也可以撤出来，如果这个叫边缘化，我还愿意被边缘化。文化不存在

主流，因为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。文化本来就存在，没有优劣，没有主流非主流，每个文化都有同等价值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也是肯定的，但是政治层面确实有主流，有利益冲突的。因此，主流是指从事政治活动的人而言的，是政治游戏而已。

来澳洲打工的人，他们本身住的也很好，但就心态来讲，他们对主流和非主流更敏感，更在意，更愿意把中间的这个线划分清晰，我们如果已经在这个主流里面飘了的话，看到的是微观层面的，对中间这个线我是不在乎的，我认为这个线是不存在的，可以跨过去，可以退回来。有些人觉得很难逾越这个线，觉得这个线是无形的，总觉得另一边邻居的草坪永远是绿的，那就只剩下渴望而不可及了。

当有人问我，“澳大利亚和中国，哪个是你的家？”我会说，澳洲是我的家。而情感家是在中国。我希望自己的祖国强大起来。但当回到中国的时候，那里的一切又让我感到不那么习惯。我觉得祖国是祖宗的国，不是我们现在的国。

我一直在问自己，假设有一个机会，让我回到中国去工作生活，我还能融入中国文化吗？我每年回国四五次，我懂酒桌文化，熟悉人情世故。就连父母领着很小的孩子下饭馆，把服务员指点的团团转的行为都习以为常。但在公共场合又听不得大呼小叫，忍受不了不排队现象。自己觉得在国内生活会很疲惫。我已经不习惯拜金主义，不看重职务升迁。那种不舒服、不习惯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个陌生人的、与中国文化习惯产生了隔阂。

虽然我走进澳洲文化，心依然是中国心。我现在是三个大学的荣誉教授。把自己的研究项目与中国的几个大学结合起来，我诚心希望能够为中国培养更多的博士生，通过我的指点，帮助他们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名列前茅。通过自己的教学增进中澳洲之间的友谊。我是中国面孔澳洲公民，一颗中国心，一个澳洲情结；我希望中国和澳洲的国旗同时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升起。在这片绿草成荫，鸟语花香的土地上以平和的心态，放松的自我，畅想生命之歌，感受阳光、大海、人性、天地中所有的神奇与奥妙。